1. 东北沦丧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月光淡淡,疏星点点,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高粱地里，黑沉沉的一片。一个罪恶的阴谋正在这里付诸实施。

日本关东军河本末守中尉带领松冈军曹等七八名部下，来到此处的南满铁路旁边。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把几包炸药放在铁路东侧路轨一个接口处的两边，并把它点燃起来。

“轰!”一声巨响,被炸坏的两根枕木和 1 米左右的铁轨，向四处崩散。

掩着两耳伏卧在铁路附近的河本，如释重负般地站起身来，拔出手枪向距离这里 800 米左右的中国驻军北大营方向开枪射击。接着，通过随身携带的话机，向日本驻沈阳城的特务机关报告：

“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正在战斗。”

与此同时，日本兵将他们前一天用刺刀挑死的 3 名中国乞丐，套上了中国士兵服装，抬放在爆炸现场。

一切都是那样地井然有序。

沈阳城内日本特务机关。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日本关东军代理司令官、先遣参谋板垣征四郎，很快发出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第五大队攻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击沈阳城。

身在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情报后发出电令：第二师团向沈阳集中，并发动攻击；步兵第三旅团第四联队及骑兵第二联队攻击长春附近的中国守军；独立守备第一、第五大队向沈阳前进；第三大队火速占领营口；第四大队进攻凤凰城并占领安东(今丹东)。同时，本庄繁要求日本驻朝鲜军队，迅速增援东北。

此时，沈阳南站日军的 24 厘米重炮开始向北大营和飞机场轰击。进攻沈阳、北大营的日军各队已纷纷出动。

沈阳、北大营方向，人声鼎沸，火光烛天。

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以关东军为先行，炸毁铁路，贼喊捉贼，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行动，由来已久。

近代，在西方列强纷纷东来进行殖民主义侵略的情况下，日本从 1868 年“明治维新”开始，带着封建武士道精神，匆匆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这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密地狭，资本积累不足。为了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生存，日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企图通过对外军事扩张，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1868 年 3 月 14 日，日本政府发表《天皇御笔信》，公开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中国和朝鲜是日本的近邻，日本要对外扩张，其主要目标就是中国和朝鲜。

1874 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虽独占未逞，却从中国索取了 50 万两白银的赔款。

20 年后，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马关条约》,从中获得控制朝鲜、在中国开矿设厂、割占中国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等权益，并索取战争赔款 2 亿两白银。

日本割占中国辽东半岛，打乱了沙俄欲侵中国东北的计划。于是，沙俄联合德、法两国从中干涉。日本慑于沙俄等国的武力威胁，答应归还辽东半岛，但却从中国索取了 3000 万两白银以作补偿。

此后,沙俄以“干辽有功”,取得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从满洲里到海参崴)的权利,霸占了旅顺、大连,控制了中国东北。

日本为从沙俄手里夺回中国东北，与俄国矛盾尖锐化。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1905 年,俄国战败,日本通过《朴茨茅斯条约》及其《附约》,攫取了中国辽东半岛和中东路南段(长春至旅顺)的权益。

1907 年,日本又通过《日俄密约》,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平分秋色。以东南珲春至西北洮儿河上游一线为界，线以南即所谓“南满”,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1912 年,日本通过又一次《日俄密约》,享有了在东部蒙古的权益。日本把“东蒙”与“南满”联系起来,视“满蒙”为其特殊地盘。

在这一系列的侵略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逐渐在中国东北设立了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满铁”(南满铁路股份公司)和奉天总领事馆四大侵略机构。他们把中东路南段称为“南满铁路”,把沿路两旁 30 里之内称为“铁路附属地”。在此“附属地”内,日本人设有警察和守备队,占领了所有的矿山,控制了

教育、卫生、行政、司法、工商业等各个方面。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军阀张作霖，将其影响向整个东北渗透。

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 9 月，日本人出兵山东，从德国手里夺得了在中国山东的权益。

1915 年，北洋军阀袁世凯急于称帝，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提出了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

1927 年，日本帝国主义将其以中国为基地、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年夏天，日本人召开“东方会议”。会后，主持这次会议的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把会议精神拟成秘密文件，上奏天皇，即所谓‘田中奏折’。奏折里称 要征服全世界，就要征服中国 要征服中国，就必须首先征服满蒙。

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国民党北伐军北进，3 次出兵山东。1928 年 5 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在此惨案中，中国 3000 余名军民死于非命，财产损失达 3000 多万元。

1928 年 6 月，军阀张作霖在国民党军队的讨伐下，兵败撤回东北，因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进一步侵略要求，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

1928 年 12 月底，东北军政首要人物张学良，公开宣布归服以英、美为靠山的蒋介石南京政府。1929 年，日本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困扰。为了防范英、美势力向中国东北的渗透，摆脱经济危机的严重困扰，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紧张的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准备。

1929 年 7 月，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起草《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和《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强调‘解决满蒙问题’是

“日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

1930年 9 月，关东军又完成了《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

同年，日本政府在一个关于 1931 年度形势判断的文件中,提出了‘满蒙’建立新政府和分三阶段占领东北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1931 年 3 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演，称中国东北是日本对美、俄、中作战上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据点’。

1931 年 5 月，日本关东军又制定《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决定要在中国东北‘进行某种策动,并尽可能利用此种机会’。还强调“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

1931 年 7 月,两门 24 厘米口径的榴弹炮，由日本神户秘密运抵沈阳。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制造排华气氛，寻找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时机。日本首先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挑起中朝农民之间的冲突。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又以中国驻军处死非法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的中村等日本间谍为契机，到处煽风点火，大肆渲染战争气氛，疯狂叫嚣要以‘中村事件’‘打开满蒙问题僵局’。9 月 15 日,石原莞尔提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是在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先行条件”。

在此期间，关于在柳条湖发难的阴谋，也在紧张筹划中。据参与密谋的花谷（时任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的少佐参谋）后来回忆说：

“1931 年春季左右，我们拟好了柳条沟事件的大致计划。

“密谋决定：

“一发生事件，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动军队，一夜之间占领奉天，在列国还没出来干涉之前，很快地占领预定地域……。”

为了使柳条湖事件能够成功地达到预期目的，事变前关东军进行了频繁的实战演习。9 月 14 日至 17 日，日本军在北大营一带的演习，更为逼真。有一次，日军演习甚至贴近了北大营的围墙。17 日的演习中，日本警察两人，竟闯入北大营将电线切断。

日本帝国主义几十年来妄图以东北为据点吞没全中国，以中国为基地称霸全世界的野心和梦想，乃至几十年如一日的精心策划和准备，都使得中国东北难以逃脱被其武装侵占的悲惨命运。

当然，中国政府如能及早防范，并能组织起有效地抵御，事情可能是另外一种状况。可是，事实恰恰与愿望相反。

1927 年 4 月以后，中国的执政者，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

1930 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紧锣密鼓欲以武力侵略中国东北时，蒋介石为打垮内部异己力量，正醉心于“中原大战”，东北张学良手下 7 万余主力部队也被抽调入关参战。“中原大战”耗资巨大，人民牺牲不计其数，使中国元气大伤，再加上东北防务空虚，这就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了有利时机。

即使如此，“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驻军也还有近 20 万的兵力，而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即正规军和警察合在一

起,也不过 2 万余人。若将这 10 倍于敌的兵力武装组织起来,再加上东北民众的力量,对付日军侵略也还是有希望的。

然而“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剿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又成了蒋介石的当务之急。1930 年 10 月,1931 年 4 月和 7 月,蒋介石连续 3 次调集重兵“围剿”红军。与此同时,对于东北所发生的外患,蒋介石则从容有余,认为是第二位的事情。

东北“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

“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又在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张学良面对东北的紧张局势,曾连续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的回电则是:

“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既然中国最高当局“不予抵抗”,东北虽有兵备,也形同虚设。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正在北平的剧院看戏。东北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正在为父作寿而应酬宾客。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沈阳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当夜不在军中。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里 11 时左右,当日军炮声、枪声响

起时“早令收缴军械”的沈阳北大营士兵,先是一片混乱,继而仓惶退却,四处逃散。

沈阳城遭到攻击时,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曾以长途电话请示北平的张学良,回令却是:如日军索取枪支,可无条件交予。从而,全城 6000 名警察,全部缴械。

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父殁回锦州治丧,由军署参谋长、省府委员、汉奸熙洽代理。21 日,当日军进攻时,熙洽借口上级有“不抵抗”指示,先是命令长春守军退让,迎接日军进城,继则按日军要求,使吉林军队缴械。

哈尔滨当时是东北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日军一到,特区长官张景惠就发出布告,正式成立了伪“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

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如入无人之境。

9 月 19 日晨,日军占领了沈阳。同日,占领长春、公主岭、辽阳、安东、凤城、本溪、抚顺、营口、海城、盖平、复县、开原、昌图等许多城市。

21 日,日军占领吉林省省城吉林市和吉长、吉敦两铁路。驻朝鲜日军也通过鸭绿江开进东北。

22 日,日军占领辽源及四洮路。

不到 5 天,辽、吉两省几乎全部沦陷。

10 月 8 日,日机轰炸锦州。

11 月 19 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

1932 年 1 月 2 日,日军攻占锦州。

2 月 25 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到此为止,不到 5 个月的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基本上全部占领了东北三省，一口气吞掉了相当于日本本土 3 倍的中国国土。

耻哉！悲哉！日本侵略者贪婪、疯狂，蒋介石政府开门揖盗。东北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3000 多万同胞,从此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

东北大地，怨声四起：

“ 攘外安内 ”蒋主张，
夜赠领土百万方。
金陵城头发乱令，
叫尔 小民做羔羊！

2. 义军蜂起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 九一八 ”! 九一八 ”!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泣别了白山 黑水，
走遍了黄河长江，
流浪逃亡！
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年？
逃亡到何方？
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
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
谁使我们流浪？
谁使我们逃亡？
谁使我们国土沦丧？
谁使我们民族灭亡？
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休为自己打算，
我们休为个人逃亡，
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
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这是 30 年代后期，中国各地所流传的许多抗日救亡歌曲中的一部分。

日本侵略者的贪婪，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使东北地区遭到了近代以来空前的民族侵略。然而，中国人民不甘心受辱，东北 3000 万同胞不甘心做亡国奴。山河破碎，亲人失散的悲苦，对日本强盗的仇恨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愤怒，汇集起来，迸发了“九·一八”以后中国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

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和各界团体，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发表通电，建立抗日组织，进行抗日宣传，要求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

这场运动，自“九·一八”兴起后，屡遭蒋介石政府的镇压。但它从没停止，时起时伏，直到 1937 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直接遭受日寇蹂躏的东北同胞，从“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时候开始，就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9 月 19 日，沈阳兵工厂的工人，砸开了工厂粮栈大门，动手分粮，并有 3 万多名工人，拒绝为日军制造武器，先后离厂出走。

日军占领长春后，中东铁路工人将机车向北转移，阻碍日军运输。

9 月 21 日，哈尔滨成立了各界抗日联合会。11 月，抗日联合会发表宣言，表示：“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

武装抗日，是东北人民的主要斗争形式。

在日寇的大举进军之下，东北爱国官兵和山林草莽中的绿林好汉及广大工人、农民、学生，纷纷拿起武器，自发地组织起一支支抗日义勇军，同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著名的嫩江桥抗战和锦西古贺联队歼灭战，就是抗日义

勇军所为。

嫩江桥处在洮昂（洮南至昂昂溪）铁路线上，距离当时的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 100 多里,横跨嫩江,是齐齐哈尔的重要门户。

9 月下旬,日军占领辽、吉部分地区后,即沿着四洮路(四平至洮南)北上,急图齐齐哈尔。

这时，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不在省会齐齐哈尔。驻守在这里的爱国官兵为防止日军北犯，急调一批兵力加强嫩江桥及其以南泰来、洮南方面的防务。

10 月 10 日，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被任命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

日军首先利用叛军张海鹏北犯黑龙江省。张海鹏是中国驻军洮南镇守使，他为谋取黑龙江省省长职位，早与日军有勾结。“九·一八”事变后,他率部投降。日军许张海鹏以黑龙江省省长的职务，鼓动他北犯，以达到不直接出兵即占领黑龙江省的目的。

10 月 13 日，张海鹏命令部下徐景隆带 3 个团向嫩江桥进犯。张海鹏自己和日军一道，抵达泰来督阵。

16 日晨，张部在日军飞机的配合下，向嫩江桥发起攻击。敌军出师不利，在激战中徐景隆踏雷毙命，军阵大乱，江桥守军乘势英勇出击，致使张部伤亡严重，溃败而归。

张海鹏部队的进攻失败后，11 月初，日军准备亲自出兵攻占黑龙江省。

此时，马占山已由黑河南下，到齐齐哈尔就职。马占山就职后，电告前线将士：奋勇杀敌，以尽守土之责。他发表宣言，

表示要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马占山还调派两个骑兵旅、三个步兵团,约 1.3 万人开赴江桥，加强防务。

11 月 4 日中午，敌人开始举行大规模进攻，江桥抗战爆发了。

一开始，敌人以张海鹏伪军 4000 余人为前部,日军主力在后,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向嫩江桥扑来。中国守军死伤数十名,大兴车站被炸毁。稍后,待敌人进入包围圈，中国守军开始奋力还击，敌人攻势逐渐减弱。到晚上 8 时,敌军受挫败退。

5 日，全天激战，在日伪军的猛烈攻势下，中国守军两个步兵团从正面迎击，两个骑兵团从两翼包抄。战至傍晚,敌军再次被击退。

6 日，双方又激战了一天。这次日军增加了兵力，投入步兵两个联队，野炮 40 门,重炮 8 门,飞机 8 架,铁甲车 4 列。这次是日军在前,张部伪军殿后,气焰十分嚣张。但是,在中国守军的拼死防守下,敌军多次被打退,并遭到严重伤亡。据悉,日军一联队几乎被全歼，骑兵队也死伤殆尽。这是日军入侵东北以来，遇到的一次最有力的抵抗，也是损失最严重的一次。

江桥守军也为保卫国土付出重大代价，死伤达 600 余人。

江桥地处平原,3 天来敌人昼夜不息的炮火，已将防御工事摧毁殆尽。守桥官兵以血肉之躯拼死抵抗，无援兵增换，也无弹药补充。为了争取主动，6 日晚上，马占山下令将主力撤至距江桥 50 华里处的三间房车站一带，继续阻敌。

敌人因损失惨重,也暂停了进攻,以便进行休整、补充。

12 日，经过休整的日军，又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从 12 日到 14 日,数千敌兵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轮番向三间房中

国守军进攻,均被守军击退。日军久攻不克,兵员消耗严重,急令增派援军。

18 日晨,日军援军赶到,开始全线猛攻。这次,他们动用了飞机 12 架，大炮百余门，调动了日军第二师团及混成三十九旅团的全部兵力，计有 7000 人左右。这时的中国守军仅剩 4000 余人，武器弹药也来不及补充。江桥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

面对成倍于己的敌人，广大爱国官兵并不气馁。他们同仇敌忾，奋勇异常。炮筒折断了，他们就徒手冲上去。敌坦克开过来了，他们就冲出战壕同敌人肉搏。一天之内，官兵们击退敌人 10余次猛攻，三间房阵地多次失而复得。

然而，中国兵员损失也越来越严重。到午后 2 时许,阵地上的官兵已不足 2000 人。日军对三间房已形成包围之势。为保存实力,18 日晚，马占山将军下令向齐齐哈尔城撤退。

19 日,敌军在重炮猛攻下,迅速向省城推进。中国守军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齐齐哈尔，结束了为时半个月的江桥抗战。

1932 年 1 月 5 日,80 多名日本骑兵,从锦州出发,朝锦西县城所在地江家屯奔驰而来。领头的是日军第十九师团三十八旅团骑兵二十七联队队长古贺传太郎。

古贺被日本关东军吹捧为战无不胜的“名将”，气焰十分嚣张。这次他奉命率队到锦西一带‘扫荡”,扬言要将锦西抗日民众力量一举消灭。

6 日午后，古贺联队被锦西县汉奸县长张国栋迎接入城。当晚，日军又从锦州派来松尾少尉率领的 26 人粮秣输送监视

队,和石野率领的 28 人步兵小队。就这样，日军不费一枪一弹，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锦西县城。

消息传出，锦西爱国民众深感耻辱。平时维持治安的民团成员、一般农民以及绿林人物，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抗击日军。

县公安局局长苑凤台，6 日那天被通知去迎接日军时,就非常恼怒。一气之下，他非但没去迎接日军，反而专程回到家乡，找到本地绿林首领刘存启、刘春山等人，答应提供武器弹药，鼓动他们抗击日军。

事不宜迟,趁日军立脚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刘存启等人说干就干，立即组织人马，迅速联络周围各村子，约定于 8 日围攻县城里的日军。

7、8 日两天，锦西县城周围山上的村民越聚越多，对县城形成包围之势。

古贺闻讯,决定采取攻势,来个先发制人。

9 日午前，古贺命令松尾输送监视队回锦州领取粮秣弹药；骑兵联队村上中尉率骑兵一小队守护联队本部所在地教育局。古贺本人则亲率 50 余名骑兵,和石野步兵小队一道,由县城西门出发,前往西部一带村落‘扫荡”。

古贺出发时，汉奸张国栋为讨好日本人，婉言加以劝阻：“‘胡匪’太多,绝对去不得。”骄横的古贺根本听不进去,决意要出城攻击。

日军刚出城 1 小时左右，就遭到上坡子村附近老百姓的猛烈阻击。

不得已之际，古贺将其兵马分作两路：一路由他率领，攻打上坡子；一路为石野步兵小 ,攻打龙王庙西山高地。

在上坡子战场，千余名民团团员和村民，早已占据山上有利位置。敌骑兵左突不能，右进不得。在密集的子弹射击中，敌群马嘶人喊，乱作一团。焦急的古贺不时地嚎叫着，向来回乱窜的部下挥动着指挥刀。

在龙王庙西山高地，刘春山、张恩远为首的千余名绿林好汉、民团团员和村民，早已等候在这里。当石野小队从东、西两面向山上攀爬时，张恩远急率一部分人从北坡上山迎击，双方在山顶展开了激战。与此同时，刘春山率人穿过龙王庙村，也从东、西两面尾随敌兵攻击，日军三面受围，异常被动。

绿林好汉个个都是神枪手，英勇顽强。只听一声枪响，石野右胸被穿透，一头栽倒在地。

敌人用机枪疯狂扫射，张恩远匍匐前进，他要夺敌人的机枪，不幸右腕被打伤，鲜血直流。

刘春山、刘春雨、刘春云、刘春成兄弟 4 人都参加了这次战斗。激战中，春成、春山几乎同时牺牲。当春云抱尸痛哭之时，七八名日军乘机猛打过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春雨大喊一声："鬼子上来了，还哭什么！"兄弟二人同时举枪，一梭子出去，前边的敌人应声倒下。

上坡子、龙王庙西山的敌人不甘心败给中国老百姓，依然在挣扎。刘存启所率五六百群众，出现在县城西门外。城内敌人守军也受到威胁。

消息传来，古贺不敢恋战上坡子，急令一部分人去收容龙王庙西山石野残部，自己率部沿公路驰援县城。

料到古贺要回援县城，刘存启早已率众埋伏在距县城西门一里多路的西园子村。村东头紧靠公路北侧 30 多米处的一座炮楼，也被村民们占据。古贺人马一到，数百支枪突然开火，

猛烈射击。当古贺命令其机枪扫射时，众乡亲又迅速躲进民房。古贺认为险情已过，继续赶路。刚走到村东头，又遭到炮楼里村民的袭击。在弹雨中，日军人仰马翻，死的死、伤的伤。走在前面的右贺，也被子弹打穿了左肩、右腹，登时落马栽地。因伤势严重，古贺于午后丧命。

距锦西县城以东 30 华里，是虹螺山的支脉——一个纵横南北的山岭，山岭中穿行着一条通往锦州的公路。当山中的老百姓听说日军松尾输送队要从这条公路上经过时，公路附近的杜家屯、钱塔屯、马圈子、张相公村、陈家屯、小岭子等村落的村民，提前埋伏在这里，准备痛击日军。

上午 9 时左右，松尾输送队刚登上钱塔屯东岭，就遭到抗日民众的伏击。满山遍野的村民们，手持各种武器，把敌人围的水泄不通。敌人利用机枪的强大火力，拼命抵抗。抗日群众则用步枪、石块勇猛杀敌。激战到下午 1 时左右，松尾输送队成员，连同从锦西来的两名骑兵共 30 余人，全部被歼，无一人漏网。

12 日上午，日军大批援军赶到，围攻县城的群众已迅速撤离，结束了这场战斗。日军遭受这次痛击后，不敢再据守江家屯，把锦西县政府搬到了连山。他们称这次激战为“锦西冬季之风暴”，所谓‘夫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自发的抗日武装斗争此起彼伏。

1931 年 11 月初，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部在辽西联合项青天、张海天、盖凌香等民团武装，组成了‘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与此同时，北宁路（沈阳至北京）沿线的义县、北镇、黑